

戰後台灣「外省」菁英的台獨主張

——從雷震到張忠棟的類型分析ⁱ

陳儀深ⁱⁱ

摘要

從謝聰敏自述其 1964 年撰寫〈台灣自救宣言〉的過程中，如何受到外省籍教授殷海光的影響，吾人可以感知從自由主義出發銜接民族主義——「心同理同」的可能。1970 年出獄後的雷震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中有「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主張；而 1971 年中華民國失去國際地位的時候，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向駐華大使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建議以「中華台灣共和國」作為出路；再次，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從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派，在 1989 年鄭南榕自焚以後轉向，替葉菊蘭的台獨主張辯護，更是貼近解嚴之後、民主化台灣的政治現實。

以上這些「台獨」主張，不論是從自由主義的信仰推演而來、或是基於政府對人民的責任、或是共同生活相當一段時間之後「與時俱進」所產生的思想，皆來自「外省菁英」，本文嘗試整理出戰後台灣「外省菁英」之台獨主張的緣由或「類型分析」，一方面可以打破「本省人」才主張台獨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剛好可以藉之檢討今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民進黨執政下，台灣是否已經獨立、還須怎樣獨立的問題。

關鍵詞：雷震、殷海光、楊西崑、張忠棟、外省菁英、台灣獨立

ⁱ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使本文減少錯誤、更為週全。另，限於時間與精力，本文第四節有關張忠棟的敘述，很多摘自筆者於 2000 年發表的紀念文字〈張忠棟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初探〉，收入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0 年），頁 84-102，特此聲明。

ⁱ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Non-Taiwan-born Chinese” Elite’s Post-WWII Advocac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 A Type Analysis from Lei Zhen to Zhang Zhongdong

Chen, Yi-Shen *

Abstract

From his account of the drafting of the 1964 “Declaration of Taiwan’s Self-Help”(「台灣自救宣言」), we can see not only how Xie Congmin (謝聰敏) was influenced by “Non-Taiwan-born Chinese” Professor Yin Haiguang (殷海光), but also sense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ng liberalism to nationalism---in light of “sympathetic/empathetic feeling of the mind/heart” or the similar psychological and reasoning process. As a sequel of sorts, in the wake of his release from the prison in 1970, Lei Zhen (雷震), in his “Survival Salvation Proposal”(「救亡圖存獻議」), had followed and included the idea of “promptly annou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 Taiwan Democratic Nation’”(「中華台灣民主國」). Shortly,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lost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e U.N. in 1971, the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Yang Xikun(楊西崑), even suggested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R.O.C., Walter P. McCaughey, that 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 should be used as the way out. To go further down this road, once again, Zhang Zhongdong (張忠棟),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o, after the self-immolation event of Cheng Nan-rong(鄭南榕) in 1989, had finally decided to turn away from his previous pro-China 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a Forum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 come to that of the bereaved Widow Ye Julan (葉菊蘭), joining her in advocat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Arguably, such a stand was even closer to the democratized political reality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The above-mentioned “Taiwan Independence” propositions, whether it was derived from liberal beliefs or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to the peopl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r even the idea of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times" resulting from having had a common life together in a place for a period, had all come from "Non-Taiwan-born (Mainland) Chinese" elites. Through the type analysis approa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ir reasons for so advocating in the post-WWII Taiwan. By so doing, this might help break up the stereotype that only "Taiwanese" had been, were, or ar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be taken as a review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ready been independent or how such an independence it really is.

Keywords: Lei Zhen, Yin Haiguang, Yang Xikun, Zhang Zhongdong, other provinces, and Taiwan independence

一、前言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廖文毅兄弟開始的海外台獨運動，由於族群衝突、外來壓迫的記憶猶新，其台灣人概念並不包含戰後來台的外省人；³包括史明早先鼓吹的台灣民族主義，其「台灣民族」的概念也不包含戰後來台的外省人。⁴而1964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自救宣言〉竟能打破血統觀念、訴諸「領土／公民」(civic-territorial)民族主義，呼籲「不分省籍」合作來推翻國民黨、來建設新國家，相當程度影響到海外台獨運動的理論建構，曾有學者評論〈台灣自救宣言〉的特性，說它是超越時代限制——不訴求歷史、只訴求現在與未來，因而蘊含了它的限制與可能。⁵

但是，從謝聰敏自述其撰寫〈台灣自救宣言〉的過程中，如何受到外省籍教授殷海光的影響(後詳)，吾人可以感知「心同理同」的可能。1970年出獄後的雷震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中有「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主張；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在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不保的時候，向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表示「中華台灣共和國」作為出路，這些想法主張不論是基於政府對人民的責任，或是共同生活相當一段時間之後「自然釀成」的共同體意識，都值得注意。

最後，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從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派，在1989年鄭南榕自焚以後轉向，替葉菊蘭的台獨主張辯護，更是貼近解嚴之後、民主化台灣的政治現實。凡此，應可做一不同階段的回顧整理，嘗試整理出外省菁英之台獨主張的緣由或「類型分析」。

廿一世紀的台灣已歷經三次的政黨輪替，社會上的「國家認同」早已不受過

³ 詳見《廖文毅及其活動內幕》(光華出版社再版, 1962年)。外交部檔案, 中研院近史所藏, 〈廖文毅〉, 檔號 406/0065。

⁴ 史明先生說, 歷經荷治、明鄭與清治時代已經自然而然奠定了獨特的社會存在與民族意識, 在此基礎之上,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 51 年間, 再經過了近代化、資本主義化, 終於使台灣民族的實際狀態浮現出來, 同時, 台灣民族主義也隨之而生。」參見史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加州聖荷西: 蓬島文化公司, 1980年), 頁 691。

⁵ 吳叡人, 〈命運共同體的想像: 自救宣言與戰後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 收入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編, 《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與傳承》(台北市: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出版, 1994年), 頁 57-86。

去省籍分別的拘絆，談論台獨主張的時候還特別去追索「外省菁英」如何如何，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但是本文將發表在「李筱峰教授榮退」的學術研討會，一方面可以作為李教授大半生學術興趣和社會關懷的迴響，一方面可以從先賢的言論主張檢討今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民進黨執政下，台灣是否已經獨立、還須怎樣獨立的問題。

二、從自由主義推演：雷震、殷海光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由（人在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實際負責人則是雷震。在蔣介石為宣示政治改革決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吳國楨等自由派人士紛獲見用，1950年雷震亦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雷震曾於1950年、1951年年兩度代表蔣介石赴港宣慰反共人士，並探聽由美國主導的第三勢力「自由中國運動」（1953年改組為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在香港的發展情形。⁶

就1951年香港之行而言，從1月31日飛港，3月2日由香港搭船返台，其間見到許崇智、顧孟餘、張國燾、伍憲子、張發奎、梁寒操、董時進、李璜、左舜生等等。3月4日下午2時進基隆港，3月7日下午雷震與洪蘭友一同出席行政院院長陳誠召集之會議，兩人做了報告、說明之後，陳院長做了若干裁示，「繼由彭孟緝說話，認為今日由大陸逃出學生，均係匪諜，未免抹煞一切，武人論斷如此幼稚。」3月23日下午中央改造委員會討論港澳問題，雷震與洪蘭友被邀參加，因係根據他們兩人的報告進行討論，「最後討論本黨改造路線，報告中提出廢除學校之三民主義課程及軍隊黨部二事，大家均不甚重視。」不過等到3月29日上午，去忠烈祠公祭時遇到蔣經國，即被邀出外談話，原來蔣經國對「撤銷軍隊黨部」的提案很生氣，罵說：「你們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

⁶ 去香港的目的還包括「不僅在救護過去政治上及社會上之人物，要顧到反共青年幹部人士，使之傾向我方，使之攜手共同反共。」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頁21。

思想。」「你們這批人，本黨不知吃了多少虧，今日你們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⁷雷震遂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記載：「其態度如此無禮貌，出言如此不擇辭句，令人非常難過。回思予在港時，不知替他們辯了多少……不料彼今日以同一方法來對付我了。」⁸

到了4月16日，蔣介石在一場軍隊黨部改造委員就職的公開場合，針對雷震和洪蘭友轉述港方人士建議廢止軍隊黨部，改以政工人員代行軍隊政治教育及宣傳三民主義之機構，「予以痛切申斥，並責罵謂我等此等行動與匪諜及漢奸無異，為一種寡廉鮮恥之行為。」對此，雷震的不滿是：「予等自港返台，自應將港方意見反應出來，黨部可不採用，但不必如此咒罵。」⁹「總裁過去昭示黨員，有話要向黨部講，不能對外發表，今對黨部提出意見，又遭責罵，以後有意見亦不敢講了。」⁹第二天，雷震在日記中說：「今日心中甚苦悶，國家至此，個人又復何言？終日心緒不寧，所憂者今後如何回大陸，……個人之榮辱事小，國家前途事大。」¹⁰雷震自認為忠臣謀國，卻被總裁視為與匪諜、漢奸同類；為了反共民主的理想，短短一個多月（為了同一件事）得罪蔣氏父子，註定了雷震在一九五〇年代所走的坎坷路。

《自由中國》初期的言論明顯站在「擁蔣反共」立場，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但1951年6月初《自由中國》刊登夏道平執筆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即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1951年6月1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第4卷第11期，社論題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它描述了一樁所謂金融犯罪的案情：

本年三月間有人在土地銀行開立一個戶頭，土地銀行給這個戶頭開發本票（本票通常都是見票即付的，但土地銀行開給這個戶頭的本票，都是期票），

⁷ 傅正對此做了註腳，謂蔣經國的「軍隊黨化」主張甚為鮮明，例如1951年1月23日演講〈黨是革命軍的靈魂〉，1953年11月12日演講〈新時代、新精神、新作風〉時又強調：「我覺得軍隊裡面一定要有黨，這是牢不可破的真理。」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71。

⁸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70。

⁹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81。

¹⁰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82。

於是這個戶頭就利用這種本票作抵押，到處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的時候，經保安司令部一併破獲。案件是五起，人犯達二十餘名，全部案款台幣一百一十萬元，抵押品都是土地銀行的本票。這五件案子，經於五月一日由保安司令部軍事檢察官提起了公訴。

文章刊出一個星期以後，即6月8日王世杰就告訴雷震，該文已與保安司令部開火，該部決定要與雷震對抗。在王世杰看來，這篇文章（說的）是事實，但今日「為打倒共產黨要用這些人，故有時不能不遷就」，所以王建議再做一篇社論，說明並不反對「經濟管理」且肯定辦理人員之勞績及操守廉潔，雷震應允，預定在下一期即6月16日刊出。其次，根據6月9日的日記，保安司令彭孟緝親自打電話到雷震家中，囑家人轉告：《自由中國》的文章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從今日起要與我算帳，絕不放鬆，法律解決也可以。」雷震立刻詢問王世杰，事已至此那篇文章還要寫嗎？王說電黃少谷（行政院秘書長）再說，不久陶希聖來電話，謂文章仍須做，陶將於下週一（6月11日）召開記者會正面說明金融管制的立場。

彭孟緝以電話威脅雷震之後，6月10日又去找王世杰要求雷震等道歉，王告以不可；另一方面，雷震於6月9日、10日找夏道平（那一篇惹禍社論的執筆者）寫那篇新文章，「經詳細檢討後繕正，下午親自送至雪公（即王世杰）處」，不過王世杰對文章仍不滿意，囑重寫，「要說明保安司令部此次是為打擊地下錢莊取得證據之意，並不是為得獎金。」同樣在6月10日，雷震繼續「危機處理」——訪黃少谷不在（？），繼續訪陶希聖，陶說他有勸彭孟緝不可要《自由中國》採取什麼行動，以免大家都「不好看」，陶還說日前《大華晚報》因登載蔡斯（美國第一任軍事援華顧問團團長，1951年5月2日才正式在台北辦公）失去皮包的消息，保安司令部馬上將人捉去關了，雷震雖然沒有立刻被「捉去關」，不過6月11日金山街《自由中國》社門口有武裝特務二人在牆外觀看毫不避人，除監視外並有威脅之意，雷震「憤極」乃電黃少谷、吳主席，請其轉告彭孟緝不必

如此，並電王世杰及陶希聖，除用照相機拍下兩張照片，也請近鄰的余井塘和蔣勻田來看（作證）。¹¹

新的社論〈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定稿之前，經過總統府王秘書長、行政院黃秘書長以及陶希聖往返修正，原本雷震說不敢完全作主、還要問編委會，陶希聖於是告誡：此事如不能了，則最後責任必落到雪公（王世杰）身上，雪公與你有數十年交情，不應使他為難，故請勉強為之。¹²

9月4日雷震被邀出席一場蕭自誠主持的座談會，黨部要員多人在場，其中除了周宏濤態度惡劣、彭孟緝「認為我是報復他」，陶希聖亦抱怨「為什麼要弄到胡適之與政府對立」。更令雷震生氣的是，大約9月12日程滄波見行政院長陳誠時，陳誠血口噴人「謂我說情不遂而書此文以報復之，又說我做生意，走私、套匯，貨物在海關被扣」，**對門口派來特務一事，他完全否認，甚至說係自己搞的……完全聽彭某一人的話**，信口胡說，我聞後午膳不能下嚥。……我之氣因為他是行政院長，負政治實際責任，怎可隨意汗巖。」¹³

這是1951年發生的事，以雷震的總統府國策顧問身份以及國民黨內的資歷、人際關係，算是勉強渡過危機；從上面描述的危機處理過程，可以發現老朋友王世杰、黃少谷、陶希聖儘管位居要津，也幾乎罩不住保安司令彭孟緝，因為上面還有兩蔣和陳誠的獨裁心態！1951年雷震就「以身試法」證明了自由中國沒有自由，卻要捱到1960年才入獄，也真是難為他了。

過去有學者研究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指出它從捍衛「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反對國際託管台灣，到後來主動引介（在台灣成立新的國號、新的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¹⁴改變的因緣主要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之後，

¹¹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6月11日日記，頁112。

¹²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6月13日日記，頁113。

¹³ 雷震，《雷震日記（1951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9月15日日記，頁161。

¹⁴ 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對國家定位思考的歷史探討——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為例〉，《台灣風物》第48卷第1期（1998年3月），頁41-61。然而，這是兩個中國或是台獨主張？實有商榷

蔣介石與杜勒斯發表聯合公報，顯示政府已經「放棄軍事反攻大陸」，《自由中國》不表反對；其次 1959 年 9 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託的「康隆報告」發表，主張逐漸承認北京政權，讓它加入聯合國並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則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義做一個普通會員國，《自由中國》雖以社論〈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民意為依歸〉立予反駁，但已明白說出：主張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理由「只有在美國不承認共匪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意思是過去他們主張「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一旦美國不支持我方反攻大陸、且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台灣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¹⁵《自由中國》不方便明白提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主張，但特別商請蔣云田翻譯 Chester Bowles 於 1960 年 4 月發表在 *Foreign Affairs* 的〈重行考慮「中國問題」〉一文並予刊登，¹⁶文中主張「住在台灣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大陸人應有權利要求安全、獨立存在，和發展文化，翹然於共產勢力圈之外」，具體的建議是金門馬祖中立化，以獨立的中台國(An 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來解決台海兩岸的定位問題，以顯示一個非共的近代化中國社會之特異。

1960 年 9 月發生雷震案，《自由中國》停刊；十年後雷震出獄，很快就面臨「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的問題，1972 年初雷震草擬的〈救亡圖存獻議〉十條，第一條即主張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開創新局。¹⁷吾人如果對 1950 年代《自由中國》雜誌社所關切思慮的國際情勢與中、台關係問題有所理解，當不會對 1972 年雷震提出的此一主張感到突兀。《自由中國》的另一枝健筆殷海光（1919-1969），曾經在 1947 年 7 月開始擔任《中央日報》主筆，同年年底被蔣介石召見以後「心緒抑鬱」，所以 1948 年接到金陵大學副教授聘書以後就數度請辭《中央日報》的職務（而不

餘地。

¹⁵ 參見社論，〈解決中國問題必需以民意為依歸〉，《自由中國》第 21 卷第 10 期（1959 年 11 月 16 日）。

¹⁶ 蔣云田譯，Chester Bowles 著，〈重行考慮「中國問題」〉，《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3 期（1960 年 8 月 1 日），頁 8-11。

¹⁷ 關於這 10 點建議的討論，參見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 年），頁 302-314。

果)。1949年初殷海光隨《中央日報》來台，8月在台灣見到傅斯年校長而謀得台大講師職位，才完全離開中央日報。研究者大都認為殷海光的思想轉向，是從法西斯、民主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換言之，他從一個愛國者「救亡圖存」的角度崇拜蔣介石、帶有法西斯傾向，到鼓吹改革、主張以自由民主「實質反共」乃至激烈批判國民黨，生命的後二十年可以分為溫和改革要求時期（1948-1957）、激烈批判時期（1957-1969）。¹⁸

關於殷海光與《自由中國》的關係，傅正曾有貼切的說明：「殷先生之所以成為歷史性人物，主要是由於在《自由中國》所寫的文章。」「總是才氣縱橫，鋒芒畢露，衝擊力常常特別大。」「（《自由中國》）最具吸引力的文章常常是出於他的手筆，最引起爭論的文章也常常是出於他的手筆。」¹⁹傅正進一步舉例，〈反攻大陸問題〉一文被冠上「反攻無望論」的帽子，當局把帳算到雷震的頭上；籌備組黨階段的〈大江東流擋不住〉一文，對雷震和傅正的坐牢以及《自由中國》的關門可謂火上加油。殷海光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指出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這頂大帽子卻使得「這幾年來，人權自由受到嚴重的妨害，政治向著反民主的道路發展。」²⁰這時候連胡適都認為反攻大陸是「一個無數人希望象徵的一個招牌，我們不可以去碰的」²¹，遂引起殷海光反駁，以「講理的自由」諷刺胡適無法講理。²²日後，我們從彭明敏師生1964年擬發表的〈台灣自救宣言〉讀到：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對外可以要挾中共以自重，對內可以厲行恐怖統治，延續政權。」²³實有似曾

¹⁸ 簡明海，《救亡與啟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1月，頁92-112。

¹⁹ 傅正，〈對殷先生的一段懷念〉，收入《全集·殷海光紀念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276-277。

²⁰ 殷海光，〈反攻大陸問題〉，收入《全集·政治與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511-518。

²¹ 胡適，〈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1日），頁9-10。

²² 關於胡、殷兩人自由主義之強度與純度比較，可參考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7年）。

²³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5年），頁150-151。

相識的感覺。²⁴

既然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且不應該用國家的大帽子來迫害個人自由，殷海光難道沒有想到統獨問題？根據殷的學生王曉波在 1996 年受訪時說：「殷先生應沒有分離主義的傾向。他被指為『反攻無望論』的觀點，主要是認為既然反攻暫時無望，就應實行自由民主，不可以反攻大陸做為獨裁的藉口。真正的台獨意識是在大學雜誌之後才產生的。」另一位學生劉福增稍早在 1993 年受訪則說：「殷先生曾言：『你們台灣人要獨立是你們的事情。』許曹德問殷先生此問題，他則不置可否，他沒有表示支持或反對之意。因為在當時，關於台灣地位的問題是不可言及的，這對當局而言是非常敏感的事。殷先生對歷史處境是非常清楚、冷靜的。」但是，殷海光的夫人殷夏君璐於 1994 年被問「殷海光當時有無特定的統獨立場？」就回答說：「關心中國的發展，但無特定的立場，認為先把台灣搞好比較重要。『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從主張统一到反統一，若殷海光還活著相信也會反對統一。」²⁵

不過，回到殷海光自己的言論，他也曾經在組黨運動中敏感到本省人、外省人的問題：

近年來，「外省人」和「本省人」結婚的一天多似一天。二者為什麼一定不能在一起組織政黨？只有抹除「外省人」和「本省人」這一條人為的界線，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才會成功。新黨要求實現他們底目標，必須不在「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作一劃分，而只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間作一劃分。²⁶

²⁴ 金恆煒還進一步拆解《自救宣言》，一段一段與殷海光的思想言論相對照，見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 344-364。

²⁵ 三篇訪問紀錄俱見簡明海，《救亡與啟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附錄。王曉波和劉福增的訪問是簡明海所為，殷夫人的部分是蘇瑞鏘和簡明海共同訪問。

²⁶ 殷海光，〈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2 期（1960 年 7 月 16 日），頁 12。

金恆煒先生稱讚殷海光的這一段話「堪稱石破天驚之言」，而且「既然反攻無望，只有建設台灣，立足台灣，外省人與本地人共同為民主打拚之一途。」²⁷此外，關於〈台灣自救宣言〉從寫作到送印，主要起草者謝聰敏說出一段秘辛：

〈自救宣言〉要出版以前，我每次都和魏廷朝一起去找殷海光教授，但最後一次，我半夜單獨拜訪他，他在庭院中的小書房接見我。那是八月初一個炎熱的夜晚，他穿著短袖衫露出瘦弱的胸脯，我說：「老師鼓勵人民抗拒暴政，如果有一天台灣人起義，但不知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因而傷害到你，你會怎麼想？」他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說：「我情願受害！」他的話深深感動了我。²⁸

後來，金恆煒為了印證〈自救宣言〉與殷海光思想間的關聯，2016年5月29日特地去訪問謝聰敏先生，歸納的重點之一是：「殷海光先生贊成我所有意見，而且還是我看法的推手；他作出了各種斬釘截鐵的論斷。」²⁹既然全盤接受、贊成謝聰敏的意見，當然就是贊成台獨了。

綜上，殷海光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台灣人的同情、對組黨運動以及自由民主價值的支持顯而易見，對統獨立場的表態則由於時代的限制似不甚清楚，只在私底下例如與謝聰敏交談時才有所吐露。最後，從一位台大哲學系畢業、殷海光的學生許登源的回憶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證，許登源說：

如果我沒有把殷海光的思想狀況做一定程度的解釋的話，我就沒有辦法讓人家信服殷海光為什麼會主張台獨。一九六四年，殷海光叫林照田（後來擔任台大哲學系教授）帶話到柏克萊來給我，要我去搞台獨

²⁷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355。

²⁸ 張炎憲、陳美蓉、游美琪採訪記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年），頁97。

²⁹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344-345。

運動，但是他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團結外省人。……他不贊成海外台獨運動者反對外省人的做法，他認為台灣獨立運動一定可以搞，但一定要團結外省人。……

對於殷海光主張搞台灣獨立，我可以了解，許多他的朋友和學生則無法了解，會認為我是在杜撰。當時在場的人，像林照田、吳泳義（殷海光的學生）、陳妙惠（我太太）都還在，他的message我沒有聽錯，我想傳達的人也沒有聽錯。當時我很不高興殷海光將此一重要訊息，叫我一個學弟來告訴我（當時我又對他不了解，而且當時講台灣獨立是被視為死罪），因此我心情很不舒服，……但我後來比較能了解，他實在是無路可走、無人可託，是被逼上梁山的狀況。³⁰

三、改國號、立新憲以追求政府之存在：外交家楊西崑

楊西崑（1909-2000），字宿佛，出生於中國江蘇省奉賢縣，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曾在北大擔任助教、後轉至西南聯大任講師，抗戰勝利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45年在紐約巧遇傅斯年，傅斯年把他推薦給駐聯合國代表郭泰祺大使，郭奉調回國後又推薦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當專門助理。1948年楊西崑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專門委員，1952至1955年擔任聯合國託管理事會西非訪問團委員，1960年奉調回國後擔任外交部西亞司司長（非洲司成立後即由楊西崑兼任司長）。³¹1960年由於大批非洲新興國家進入聯合國，他們帶著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對於來自美國的壓力有反抗心理，連帶使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受到挑戰；由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案在那個階段被美國以「緩議案」處理，非洲國家對此表示不耐，1960年的緩議案雖以42：34獲勝，但棄權國高達22國，幾乎得不到非洲國家的支持。於是，

³⁰ 薛化元訪問，楊秀菁、蘇瑞鏘等紀錄，〈許登源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50期，頁168、170、171。

³¹ 丁慰慈撰，〈楊西崑（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中外雜誌》67:6=400期（2000年6月），頁76-78。

1961年美國和中華民國一方面祭出「重要問題案」的程序手段阻擋北京入會，另一方面為了聯合國大會的票數，以援助作為政策工具、拉攏非洲國家的支持。換句話說，由美國負擔（大部分的）資金、由台灣提供人力，前往非洲提供農業援助，這就是有名的「先鋒案」。³²

主導「先鋒案」的就是「非洲先生」楊西崑。六〇年代美國的甘迺迪政府頗思以「兩國中國」方式解決代表權爭議，但因非洲國家的票數奧援，使得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得以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例如1966-1968年義大利與加拿大等國為解決中國代表權爭議、幫台灣保有國際地位，特提出「研究委員會案」，針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做研究」，由於中共入聯漸不可擋，「研究」的結果很可能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是為了避免兩個中國的結果，對於友邦連續三年的提案，台北和北京竟然聯手打壓三年。³³美國支持的「先鋒案」在1971年年初，由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正式通知（核准大約1000萬美金給台灣使用三年）謂這是最後一次金援，等於宣告「先鋒案」即將結束。有研究者評論，十年間來自非洲的奧援，其實只是導致中華民國政府「對自己身分與實力產生錯覺，進而延緩對現實的認識。」³⁴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內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³⁵眾所周知，隔年2月就有尼克森訪中的上海公報。1971年11月26日即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甫滿一個月，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就接到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的緊急電話，要求秘密會談，談話內容就是後來國務院解密的「台北5869電郵」（1971年11月30日）。**根據馬康衛的報告，楊**

³² 劉曉鵬，〈從非洲維持美台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台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162-178。

³³ 詳見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頁220。

³⁴ 劉曉鵬，〈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62、166。

³⁵ 薛化元編著，《台灣地位關係文書》（台北：日創社文化，2007年），頁143-144。

西崑提出的「救台灣」策略是：（一）發表聲明，宣布在台灣的政府與北京的政府毫無關係；（二）此項聲明應以新的政府名稱，即「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名義發表；（三）聲明應指出，上述名稱所用的「中華」沒有政治意涵……有如「阿拉伯」國家在其國家名稱前加「阿拉伯」一樣；（四）在做此宣布後，應即凍結憲法、解散國會，改成國會一院制，國會議員三分之二由台灣人、三分之一由外省人組成；（五）進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未來地位。³⁶

2014年3月15日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應邀來台演講〈台灣前途與主權獨立策略〉時，公開提起這一份2002年解密的「台北5869」檔案，他描述上面的內容顯然不是靜態的主張，而是動態的方略，即楊西崑尋求美國支持台灣獨立，他建議由美國副總統安格紐（Spiro Agnew）出面遊說，或安排蔣介石信任的美國老朋友來勸說，楊西崑主張蔣在做此宣告的同時，應動用緊急權擱置憲法、解散國會……；當時有媒體報導的標題「譚慎格爆料 蔣介石曾同意台獨」³⁷筆者認為恐有誤會，因檔案本身並沒有「蔣介石曾同意」的跡證，重點應是楊西崑的建議方案，包括請美國方面幫忙說服蔣介石。不過，馬康衛在報告中分析楊西崑的看法「反映可以忍受之概念的外層」、「低估改變中華民國國際身分在國內及外國造成的後果」。³⁸由於尼克森訪中已經箭在弦上，華府對於以上的建議並無反應。

1978年12月15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自1979年元月1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楊西崑以中華民國特使的身分赴美商談未來雙方關係，花了兩個月共三十餘次談判，雙方同意互設「北美事務協調

³⁶ 王景弘，《台灣會生存下去——兩蔣因應美中關係正常化內幕（1969-1979）》（台北：玉山社，2015年），頁143-144。同一個文件還轉述楊西崑的話說，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在夏天訪問日本，見了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兩位日本領袖都請張群密告蔣介石，他們認為中華民國未來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獨立）的措施，放棄對中國大陸的一切主張和虛構。

³⁷ 林冠妙〈譚慎格爆料蔣介石曾同意台獨〉，民報（2014年3月15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d19f43fb-73e8-4c8f-90b0-98c74d1d187a>。

³⁸ 黃淑蓉〈密商台獨楊西崑曾請美遊說蔣〉，中時電子報（2014年4月1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19001006-260309>。原檔出處為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1978年12月31日，楊西崑在華府雙橡園主持中華民國大使館的降旗典禮。1979年楊西崑調任駐南非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89年奉調返國，接任外交部領事人員講習所所長，1992年6月退休，2000年元月6日逝世，享年九十歲。³⁹楊氏一生的職涯可謂與中華民國坎坷命運密不可分，惟過去很少人會注意他曾經大膽主張「獨立救台灣」，儘管花蓮縣政府文化局近年成立了一座「楊西崑紀念館」，⁴⁰但似乎只著重他和非洲邦交的關係，看不出主事者有注意到楊西崑政治主張的這個特別面向。

四、與時俱進：台大教授張忠棟

張忠棟教授（1933-1999）出生於江蘇無錫，本籍湖北省漢口市。1951年台南二中畢業、1955年台大歷史系畢業，1963年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留校擔任講師，不久赴美留學、1967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返台繼續任教，1972年再度赴美，1973年獲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1974年9月即成為台大歷史系教授。⁴¹在美期間正逢聯合國席位易手、尼克森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從而使台灣「風雨飄搖」的時刻，張忠棟曾經忍著牙痛寫一篇長達萬字的〈奮起圖強〉寄回國內發表，其後四、五年內陸續寫了幾十篇文章，遂於1977年挑選三十幾篇輯成《大學教授的言責》出版。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感慨：國家處境艱難、外交日趨孤立，「大家正該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然而，多數大學教授還是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裡，很少人願意出來慷慨陳詞，把救國的道理說個痛快透切，激勵士氣、鼓舞人心。」⁴²他反對這種退避的態度，主張公開發表言論，「只要自問目的是在救國」，就不必顧慮其他。

張忠棟屢次回溯自己改變旁觀態度、「開始作文」的動機，就是在那「退

³⁹ 丁慰慈撰，〈楊西崑（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中外雜誌》67:6=400期，頁76-78。

⁴⁰ 吳采璋，〈楊西崑紀念館〉，《東海岸評論》191期（2004年6月），頁64。

⁴¹ 潘光哲，〈張忠棟教授生平簡譜〉，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允晨文化，2000年），頁206-207。

⁴² 張忠棟，〈大學教授的言責〉（代序），《大學教授的言責》（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年），頁5。

出聯合國」的惡劣環境下，從學術的正業中抽出時間和精力，做一些「幫閒」的工作，「希望在各種議論中提出一些自認比較平實的看法」⁴³。張忠棟在1975年10月即成為聯合報系《中國論壇》之編輯委員，當時的言論特色是——在中華民族主義氛圍中，仍帶著一些自由主義的色彩，例如1977年3月發表〈那裡是中國的光明大道〉一文，一方面肯定台灣的經濟成就，認為將來中國也應走這樣的路，一方面說台灣已有一些民主的經驗和嘗試，在台灣的中國人不應再作任何懷疑，以為民主不合乎中國國情。這些看法應不致引起什麼批評，倒是在文章的最後，他舉出中國歷史上分合的例子然後說：「**統一未必即優，分裂未必即劣，還要看實際的發展，以及各種條件的配合，才能作最後的定評。**」⁴⁴儘管他還說到自由地區的中國人若能善保國家的元氣、力求各方面的正常發展，隨時準備與大陸上反共的浪潮結合，便可以為國家創造再統一的盛運，但是他既然說出「統一未必即優、分裂未必即劣」，實已觸及一些極右派教條論者的痛處，⁴⁵而引來不少批評甚至辱罵。

張忠棟在七〇年代寫過一篇〈「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批評當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可能朝向「兩個中國」的趨勢，就是認為台北和北京分別代表兩個不同中國的政府，對於各自控制的領土有其主權，美國可以分別建立邦交，將來也不必一定要統一，張忠棟說：「我們不能接受這一方案，因為這一方案的接受，無異表示我們也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表示我們願意放棄大陸領土，也表示我們放棄將來重新統一的機會。」⁴⁶還有更荒謬的『一中一台』的說法，認為中國只有一個，由北平政權代表，我們則應獨立，另建『台灣共和國』的政府。這種謬論我們更加無法接受。我們以中華民國的國號立國，長保此一國號，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海外的同胞才會認同我們，大陸的同胞也有機會認同我們。」⁴⁶這

⁴³ 張忠棟，〈自序〉，《鄉土、民族、國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頁3。

⁴⁴ 張忠棟，〈那裡是中國的光明大道〉，收入《鄉土、民族、國家》，頁1-9。

⁴⁵ 詳見侯立朝，〈聯經集團三報一刊的七大「政綱」〉，《中華雜誌》第173期（1977年12月），頁15-19。李慶榮，〈張忠棟的文章值得國人嚴重注意〉，《中華雜誌》第175期（1978年2月），頁37-40。

⁴⁶ 張忠棟，〈「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

是1976年9月30日發表於《聯合報》的一篇「反台獨」的文章，這個階段的張忠棟，雖然明顯維護中國認同、反對台獨，但是從1977年（上一段所述）「統一未必即優，分裂未必即劣」來看，已包含著自由主義的質素。

到了八〇年代，對於黨外政團使用「民主、自決、救台灣」的政見，尤其「自決」一詞，一度被官方認為是「台獨」的同義詞，甚至暗示黨外和中共掛鉤，張忠棟甚不以為然，他說：自決是一種過程，台獨頂多只是自決的可能結果之一，如果執政者切實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行三民主義，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則自決的結果可能是維持現狀，可能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斷斷沒有把「自決」和「台獨」劃上等號的理由。⁴⁷不過黨外運動的領導人物幾乎全是本省人，也是黨外被認為「地方色彩太濃」的原因，張忠棟並不否認這個事實存在，但他認為那些一方面痛斥黨外地方色彩，一方面又阻止大陸人和黨外人士來往的人，才應該對這個（省籍隔閡）現象擔負最主要的責任。於是張忠棟對七十高齡的費希平立委表示推崇，認為他僕僕風塵、南來北往，和黨外的本省籍領導人物打成一片，也得到黨外選民的尊重和歡迎，「無形之中，不知化解了多少省籍隔閡。」⁴⁸這是1983年12月發表的看法，張忠棟似乎從費希平的身影，看到他自己未來要走的道路。

歷史學者李筱峰教授認為，張忠棟從「統」走向「獨」的思想光譜的中間地帶，是在1988、1989年之間，⁴⁹筆者也接受此說。因為1988年李登輝之繼任總統，張忠棟認為是依照憲法之理所當然，若有人主張刻意安排大陸人做總統，一方面不見得有助於統一、一方面也違背民主，「如果為台獨犧牲民主是不智之舉，為統一犧牲民主同樣是不智之舉。」⁵⁰這裡有以民主為前提，企圖消弭統獨對立的

文集》，頁 175-177。

⁴⁷ 張忠棟，〈選舉之後看黨外〉，收入《政治批評與知識分子》（台北：自立晚報社，1985年），頁 48。

⁴⁸ 同上註。但費希平受到無情的政治裁誣，有人假造信件寫給他，表示他在替中共執行「飛鴿計劃」。

⁴⁹ 李筱峰，〈國家認同的轉向——以戰後台灣反對人士的十個個案為例〉，《「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 351。

⁵⁰ 張忠棟，〈台灣政局的再思考〉，《中國論壇》第 299 期（1988年，3月10日），頁 4。

用心。在前一（1987）年，發生蔡有全、許曹德案時，張忠棟就說：「台獨是政治問題，……越是想用力量消除它，它反而越是擴大，越是複雜。」⁵¹他的意思是政府應該在國會全面改選之類的政治改革著手才是解決之道。其次，1989年在一場海內外華人學者參與的座談會上，張忠棟獨樹一格地說：「我們恐怕應該要跳出中國統一的圈子。」⁵²「不要以為我們所做的一定會影響大陸，甚至認為長期以後因此就可以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這樣的願望恐怕是過份美好。」⁵³「希望對方要絕對尊重我方的發展，這是根據台灣居民自己的選擇，不是根據大陸或海外中國人的選擇，來做最好的發展。相同的，我們也尊重大陸十億人民自己的選擇。」⁵²這時候的張忠棟已經放棄多年以來主張健全發展台灣的政治經濟以號召大陸同胞、以影響大陸走向的說法，他現在一方面尊重中國大陸人民的自由選擇權，一方面要求對方「絕對尊重我方的發展」，這是張忠棟告別統一的意識型態、主張自決論的明證。

1989年春天，主張台獨的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身殉，是年冬天他的遺孀葉菊蘭參加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以她為代表的台獨訴求氣勢旺盛，同選區的國民黨候選人郁慕明（後來成為籌組新黨的要角）則高掛「一語道破毒計、一棒打扁台獨」的文宣標語以為反制，於是張忠棟就在自立晚報發表〈道不破，也打不扁〉的文章，他認為台獨主張的出現應由「丟失大陸的人」負責，「執掌政權而不能統一國家的人也要負責，如果……不能以待罪的心情與人民溝通協商，反而把不同的主張……視同叛亂，只有引起更大的反感，達不到嚇阻鎮壓的作用。」⁵³張忠棟雖然只從歷史成因、設身處地的（形式）角度為台獨主張講話，但是在「葉菊蘭vs.郁慕明」的對壘競爭之中，他即時挺身為葉菊蘭辯護，立場甚為鮮明。

張忠棟在1990年12月應邀加入第一個認同台獨的學界團體——台灣教授協

⁵¹ 張忠棟〈台獨爭論與國會改選〉，《一年一年又一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8年），頁104-105。

⁵² 張忠棟，〈中國的21世紀——知識份子的期待〉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第322期（1989年2月25日），頁21。

⁵³ 張忠棟，〈道不破，也打不扁〉，原發表於自立晚報（1989年11月21日），收入楊國樞等著，《民主的重創與重創》（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頁285。

會，翌年4月，台教會與學生團體合組「制憲聯盟」，在台大校門口展開絕（禁）食，抗議「老賊修憲」，在活動的最後一夜，張忠棟與其他27位教授共同宣佈退出國民黨。⁵⁴1991年8月，張忠棟應邀加入民進黨，並且積極參與獨派團體與民進黨合作的「人民制憲會議」，及要求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的一百行動聯盟，是年年底並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大會民進黨籍全國不分區代表。1992年8月，又成為「『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的會員。⁵⁵

五、結論

《自由中國》雖然在創辦之初肩負以自由民主「反共復國」的時代任務，但是由於主事者的思想背景、以及與胡適的密切關係，其承擔中國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個人主義傳統，無法忍受當權者一再假借國家之名，施行特務恐怖統治、剝奪個人自由，進而思考透過地方選舉、與台灣本省菁英結合而走上反抗之路，實為自然而然的發展。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曾經指出：「從1954年開始到1957年，《自由中國》已經放棄原先主張國家目的優先的立場，明白提出個人自由優先於國家自由的立場，甚至直接指出國家自由是不通的名詞。……主導《自由中國》言論的雷震才有可能不再堅持所謂的法統，……提出自己具體的『兩個中國』主張。」⁵⁶加上，以雷震、殷海光為代表的這一群知識份子並不躲在象牙之塔，而是與本省地方菁英或本省青年水乳交融，例如1960年7月當雷震參加過台中地區與嘉義地區的「座談會」，知道很多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惡政「深惡痛絕」，遂樂觀地說：「《自由中國》刊物已深入民間，幾年來啟蒙工作，收效甚宏，大家以《自由中國》之意見為意見。」⁵⁷所以，儘管一些朋友擔心新黨將是「台灣人的黨」，

⁵⁴ 這項儀式性的行動是由台教會的青壯學者陳儀深、廖宜恩、莊淇銘等人發起串聯，包括陳師孟、林玉体、賀德芬都在這個時候「下海」。當晚遊行之前舉行退黨儀式，目的是讓絕食的學生安心停止絕食。事實上參與退黨的大多數教授早已與國民黨「失聯」。

⁵⁵ 詳見陳儀深，〈張忠棟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初探〉，收入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市：允晨文化公司，2000年），頁98。

⁵⁶ 薛化元，〈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第141期（1999年5月1日），頁45。

⁵⁷ 雷震，《雷震日記（1959-1960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356。

仍然繼續勇敢推動。

要之，雷震在經過十年牢獄之災以後，提出「中華台灣民主國」作為救亡圖存獻議的頭條意見，殷海光在1964年中秋前夕與謝聰敏夜談，對謝聰敏（與彭明敏、魏廷朝共同）的政治主張「完全贊同」，應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台灣人感同身受，基於自由主義的信念放下自己原來的國家認同，推演出接受台灣民族主義的態度（的一種典型）。

其次，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思想崇仰胡適，生活環境則是恰恰歷經七〇年代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以後的困局、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以「民主、自決、救台灣」的訴求而日益茁壯、乃至民進黨成立以及鄭南榕自焚的衝擊，終於從一個「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的外省人變成一個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人，且加入明揭台獨旗幟的社團「台灣教授協會」，謂之「與時俱進」應至為允當。關於張忠棟此一轉向的研究，有學者認為其「晚年之情感上的國家認同，其實仍然是中國，他後來對於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持，是一種自由主義式國家認同的『調整』，而並非國家認同的徹底轉變。」由於自由主義缺少形成國家認同的力量，張忠棟的偉大之處乃在於「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之道德人格的一致性，……他更能夠克制、整理自己內在情感上的一些頭緒，並毅然地走出被動地寬容，而以自己的政治參與來鼓舞了台灣國家認同的正當性。」⁵⁸

最後，楊西崑作為一個職業外交官，從他的生涯看不出他與台灣社會有甚麼「水乳交融」，但是他深知美國對台政策的基調，見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艱辛，以及變局中脫離一個中國窠臼、走向一中一台之新國家作為出路的可能，所以才會在1971年中華民國甫失去聯合國席次的時候，向馬康衛大使提出大膽的（以台灣獨立作為）救台方略。問題是，這種純粹為了政府存續所做的理性抉擇——蔣介石若聽勸並得到美國支持而走向台灣獨立，就不是戒嚴時代一般認知的革命推翻政府（敵視外省人？）式的台灣獨立，這種獨立在邏輯上一直存在

⁵⁸ 顏厥安，〈自由主義與國家認同：以一個理論問題懷念張忠棟老師〉，《當代》第157期（2000年9月1日），頁88-99。

卻不受重視。事實上，獨裁統治下的國家定位轉彎，必是由上而下，且應比民主多元社會的轉彎更為快速容易。歷史的腳步固然不能倒轉，但楊西崑的案例，一方面可以給一直以來「台獨」被窄化、醜化為「福佬沙文主義」、以及「必然仇視外省人」的污名，有一個洗刷的機會吧？一方面也可以給今日追求獨立的運動者一些啟示：政府與國家的關係是甚麼？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國家檔案常是以 GRC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稱呼中華民國，如果這個「政府」已經由台灣人完全執政，那麼所謂獨立的課題是否應該代換成（例如）新憲法運動？作者沒有要提出具體方案，而是藉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外省人」的台獨主張的回顧，提出未來方向的問題讓大家一起來思考。

參考書目

史料

- 李慶榮，〈張忠棟的文章值得國人嚴重注意〉，《中華雜誌》第 175 期（1978 年 2 月），頁 37-40。
- 侯立朝，〈聯經集團三報一刊的七大「政綱」〉，《中華雜誌》第 173 期（1977 年 12 月），頁 15-19。
- 胡適，〈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1 期（1958 年 6 月 1 日），頁 9-10。
- 殷海光，〈反攻大陸問題〉，收入《全集·政治與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 511-518。
- 殷海光，〈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2 期（1960 年 7 月 16 日），頁 12。
- 張忠棟，〈中國的 21 世紀——知識份子的期待〉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第 322 期（1989 年 2 月 25 日），頁 21。
- 張忠棟，〈台灣政局的再思考〉，《中國論壇》第 299 期（1988 年，3 月 10 日），頁 4。
- 張忠棟，〈道不破，也打不扁〉，原發表於自立晚報（1989 年 11 月 21 日），收入楊國樞等著，《民主的重創與重創》，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 年，頁 285。
- 傅正，〈對殷先生的一段懷念〉，收入《全集·殷海光紀念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 276-277。
- 雷震，《雷震日記（1951 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33 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 年。
- 雷震，《雷震日記（1959-1960 年）：第一個十年》，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40 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 年。
- 《廖文毅及其活動內幕》（光華出版社再版，1962 年）。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藏，〈廖文毅〉，檔號 406/0065。
- 蔣云田譯，Chester Bowles 著，〈重行考慮「中國問題」〉，《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3 期（1960 年 8 月 1 日），頁 8-11。

專書

- 王景弘，《台灣會生存下去——兩蔣因應美中關係正常化內幕（1969-1979）》，台北：玉山社，2015 年。
-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加州聖荷西：蓬島文化公司，1980 年。
- 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 年。
-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7 年。
- 張忠棟，《一年一年又一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8 年。
- 張忠棟，《大學教授的言責》，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 年。
- 張忠棟，《政治批評與知識分子》，台北：自立晚報社，1985 年。
- 張忠棟，《鄉土、民族、國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年。
- 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允晨文化，

2000年。

張炎憲、陳美蓉、游美琪採訪記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年。

楊國樞等著，《民主的重創與重創》，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5年。

薛化元編著，《台灣地位關係文書》，台北：日創社文化，2007年。

論文

丁慰慈撰，〈楊西崑（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中外雜誌》67:6=400期（2000年6月），頁76-78。

吳采璋，〈楊西崑紀念館〉，《東海岸評論》191期（2004年6月），頁64。

吳叡人，〈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收入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編，《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與傳承》，台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出版，1994年），頁57-86。

李筱峰，〈國家認同的轉向—以戰後台灣反對人士的十個個案為例〉，《「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323-362。

陳儀深，〈張忠棟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初探〉，收入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張忠棟教授紀念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0年，頁84-102。

劉曉鵬，〈從非洲維持美台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台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162-178。

劉曉鵬，〈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41-171。

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對國家定位思考的歷史探討——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為例〉，《台灣風物》第48卷第1期（1998年3月），頁41-61。

薛化元，〈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第141期（1999年5月1日），頁32-45。

簡明海，《救亡與啟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1月。

顏厥安，〈自由主義與國家認同：以一個理論問題懷念張忠棟老師〉，《當代》第157期（2000年9月1日），頁88-99。

報紙

林冠妙〈譚慎格爆料蔣介石曾同意台獨〉，民報（2014年3月15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d19f43fb-73e8-4c8f-90b0-98c74d1d187a>。

黃淑蓉〈密商台獨楊西崑曾請美遊說蔣〉，中時電子報（2014年4月19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19001006-260309>。